

专题论文：多元族群与多元文化

Feature Articles: Multi-ethnic and Multicultural

马来马共、伊斯兰 及其多重的思想世界*

Malay Communists, Islam and Its Variety Ideological World

魏月萍

(NGOI Guat Peng)

摘要

马来马共领袖阿都拉·西·迪 (Abdullah C.D.) 曾在受访时说：“马共推行的是宗教自由、尊重各族人民习俗的政策。我生来就是伊斯兰教徒，也是在伊斯兰教的教化下长大的。不论我走到哪里，这种信仰都不会改变。”这样的表述强调了穆斯林的自我，以及对信仰真理世界的坚定立场。无论是在殖民地抗争时期抑或独立建国后至今，伊斯兰一直是作为“反革命”或“反共”的主要因素，甚至出现“虔诚的穆斯林不会想要革命，而是发展”的声音。此外，“马来马共”在强调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甚至自诩为伊斯兰主义改革派的马来左翼脉络里，因为其“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划入马来人与穆斯林“他者”的双重边缘身份。因此本文试图梳理马来马共多重的思想世界，尤其是处在伊斯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思想张力的夹缝之中，如何安顿其作为伊斯兰信徒、马来人以及革命者的多重身份。与此同时，尝试勾勒出马来群岛与当代伊斯兰学者对不同思潮的观点，追溯马来马共主体思想的来源与脉络，以便有助于把握1950、60年代在马来群岛流转的各种思潮，彼此之间所形成的冲

* 感谢匿名评审的宝贵意见，不仅有助于厘清各不同概念的实际内涵，以及概念之间存在的模糊意义边界；同时就材料问题给予建议，使本文的资料论证更加多元与丰富。

魏月萍 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目前任教于马来西亚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中文系。
E-mail: ngoiguatpeng@yahoo.com

突、折衷和调合等，如何造就马来马共受困的思想。

关键词：马来亚、马来马共、伊斯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variety ideological world of Malay communists, especially focused on the tension among the ideological of Islam,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I will try to examine how could the Malay communist adapting their multiple identities, such as Muslim, Malay and revolutionist. At the same time, I will also draw out the view point of Malay Archipelago thinkers and contemporary Islamic scholars thought. Furthermore, traced the origin and context of the main ideas of Malay subjectivity thought, in order to help us to grasp the various thoughts circulating in Malay Archipelago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Finally, this article also try to explain how could the conflicts, compromises and reconciliations among those ideologies are led the Malay communists thought to be trapped.

Keywords: Malayan, Malay communists, Islam, Socialism, Communism

伊斯兰教不只是关乎善恶观念和私人信仰的问题，它有独断的要求，皈依者的世界观从此丕变。—奈波尔（V.S Naipaul）《信仰之外—重返非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序〉，页7。

一、边缘的边缘：伊斯兰的他者？

“马来马共”在马共群体的论述当中，相较于华人马共，一直以来并没有获得中文学界太大的关注。¹从思想的层面而言，马来马共面对来自宗教和族群身份的巨大张力，以致马来马共备受作为一名“穆斯林”以及“马来人”双重身份的内在纠葛。马来马共领袖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曾在受访时说：“马共推行的是宗教自由、尊重各族人民习俗的政策。我生来就是伊斯兰教徒，也是在伊斯兰教的教化下长大的。不论我走到哪里，这种信仰都不会改变。”（游砾译2007：12）这样的表述强调了穆斯林的自我，以及对信仰真理世界的坚定立场。其次，从

马来人反殖抗英运动脉络而言，不少马来马共把“第十支队”（Rejimen Ke-10）的抗争看作是过去马来人反殖抗争运动的延续，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爱国抗争运动”²（Abdullah C.D. 1988: 3）。而作为一名马来马共的使命，乃在于为“祖国”斗争。有意思的是，从不同马来马共的回忆录记述，可知他们的祖先分别迁移自苏拉威西、瓜哇或苏门答腊等印尼群岛，但他们本身具有清楚的“祖国”意识与“爱国主义”传统³（阿都拉·西·迪2010: 63）。这个祖国不是指祖先迁移的原始岛屿，而是指马来亚。甚至在马来亚独立后，持续反对仍受殖民意识影响的政治体制，把捍卫祖国与土地的抗争行动，视为被真主阿拉所允许的行为，如阿布·沙玛（Abu Samah）所说：“我认为我们不能不拿起武器。它是被强加给我们的。伊斯兰教也认可为树立正义、反抗暴行的战争。”⁴（游砾译2007: 76）例如在1985年11月于吉打鲁博马鲍（Lubuk Merbau）发生的流血事件。当时有18名穆斯林被枪杀，其中一名是宗教师。他们的殉难被看待为“展现了勇敢的穆斯林，捍卫伊斯兰教义、社会正义以及人民的权利等。”（Abdullah C.D. 1988: 45）

但无论是在殖民地时期，又或独立建国后的官方政府，向来以“马共反宗教”为理由，借此控诉成为共产党的马来人，无法履行作为一名合格穆斯林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也把他们判定为真主阿拉的“背弃者”或是“暴徒”。例如在马来马共撤退到马泰边境时，英殖民政府实行的政治宣传策略，即把马来马共和第十支队宣传为凶残和反宗教，让当地人心惶惶，心生恐惧，曾经一度更以巴冷刀来应付马来马共（莫哈默·沙勒·蓝利2007: 129）。赛·扎哈利（Said Zahari）在其回忆录中亦提及，英殖民政府实行的反共议程，着重于扭曲马来民族主义者斗争的初衷，散播马来人被华人共产党控制，接受反宗教和反伊斯兰的共产主义思想。他认为这样污蔑的政治议程，应该要从历史中删除（Said Zahari 2015: 23）。英殖民政府伎俩之一，是利用马来亚制片组（Malayan Film Unit）宣传反共意识，例如在一部名为《宗教师》（Iman Sermon）影片中，通过宗教师的权威口吻，传播共产主义背叛伊斯兰教义的想法（Hassan Abdul Mutalib 2010: 192-193）。

类似含有政治议程的指控，把马来马共群体及其历史认识推向一个“边缘的边缘”的位置——一是把他们形塑成受华人共产党唆使，继而背离马来人和折损自身族群利益的“马来人”⁵（Abdullah C.D. 1998: 86-87）、二是以有违伊斯兰教义的名义，把他们划入穆斯林“他者”的范畴。换言之，虽然从自我认同角度而言，可知马来马共不把伊斯兰教（Islam）、社会主义（Socialism），甚至是共产主义（communism）放在对立的位置，尤其是在反殖反帝的殖民地时期，如何抵抗阶级的压迫、消除贫穷以及争取独立的目标，成为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抑或宗教信仰得以和政治社会理论调合的契机，甚至仅是作为一种权宜的策略手段。然而，把马来马共判为“双重他者”的认知，或是把马来马共从马来社会、马来人身份特征以及马来宗教信仰组合的“共同体”中抽离出来，另外标签一种负面的社会身份，这样“他者化”形成的疏离感，正有意制造疏离效果。虽说这常是官方的伎俩，却又实在左右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

类似的双重他者化与边缘位置的判定准则与结果，更显示有必要揭示马来马共的自我思想意识、对不同思想主义的认知与接受，以及其面对思想张力的调合方式；借此勾勒出在大时代中多重思想融合或竞争的语境，以及个体的思想主体与身份安顿的境况。此外，追溯他者与边缘视角的思想构成，可检视过去历史叙述的判准与制约，反思如何可以超越特定政治议程的历史观，把握反殖运动的思想资源，所具有各不相同的分歧与张力，在经过整顿与调解后，作为历史与思想资产继承下来。因此本文试图以马来马共的回忆录、马来马共研究著作、第十支队的档案资料与出版物，以及马来马共的访谈等不同的材料，梳理马来马共多重的思想世界，尤其是处在伊斯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思想张力的夹缝之中，如何安顿其作为伊斯兰信徒、马来人以及革命者的多重身份。与此同时，尝试勾勒出马来群岛与当代伊斯兰学者对不同思潮的观点，追溯马来马共主体思想的来源与脉络，以便有助于把握1950、60年代在马来群岛流转的各种思潮，彼此之间所形成的冲突、折衷和调合等，如何造就马来马共受困的思想。

二、马来群岛与当代思想

所谓的思想，并非是悬浮于人的思维之上，个人的思维常受到不同的政治或社会文化语境所提供的养份或箝制，形成不一样的样态。尤其是在尚未有清晰的国家边界与民族国家概念的“马来群岛”（nusantara）时期，究竟如何思考伊斯兰和不同思想之间的关系，其融合和折衷的判准是什么等问题？⁶ 马来亚马来人的政治启蒙，深刻受到马来亚周边，尤其是印尼的政治发展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本节将以印尼两位革命思想家佐格罗阿米诺多（Tjokroaminoto, 1882-1934）、陈马六甲（Tan Melaka, 1897-1949）以及当代伊斯兰学者赛·胡先·阿拉达斯（Syed Hussein Alatas, 1928-2007）和卡欣·阿末（Kassim Ahmad, 1933-2017）的思想，作为思考马来群岛的民族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等思想交融的历史入口与参照。

印尼伊斯兰民族主义者佐格罗阿米诺多是个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活跃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也是伊斯兰协会（Sarekat Islam）的领导者。其于1924年完成一部影响久远的作品——《伊斯兰与社会主义》（*Islam dan Sosialisme*），是最好理解印尼伊斯兰民族主义者，如何思考与接受社会主义，并且以社会宗教形式安排具有民主治理、平等社会以及公正经济方式的文本之一。在书中，佐格罗阿米诺多区别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核心特质在于“公有”与“均分”，并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更广义寻求对世界的拯救与救赎的理念（HOS. Tjokroaminoto 2010: 19）。佐格罗阿米诺多把伊斯兰视为社会主义的形式，同时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一种共同社会生活的安排”（HOS. Tjokroaminoto 2010: 17），主张遵循“伊斯兰社会主义”（Islam Sosialisme）而非“西方的社会主义”（*Sosialisme barat*）（HOS. Tjokroaminoto 2010: 38）。佐格罗阿米诺多认为自先知穆哈默德（Nabi Muhammad）时代，在伊斯兰的生活和交往中，已存在社会主义特征的理想。如赛·胡先·阿拉达斯曾记下佐格罗阿米诺多的话：“如果作为伊斯兰人的我们，能够真正领悟伊斯兰的指令，并有决心的实践，那样便不能说我们不可能成为民主的人，以及真

正的社会主义者。”（Syed Hussein Alatas 1976: 47）佐格罗阿米诺多举例说，在每周五，不管任何身份、阶级的人，必须到回教堂祈祷，由大家共同认可的宗教师带领大家祈祷。而作为伊斯兰的信徒，每一个人一生中有一次到麦加朝圣的机会。数以千万的人，来自不同远近的地方，无论什么肤色和族群，无论什么性别、年龄或阶级，大家都穿着相同的服装，在麦加表示他们对真主阿拉的尊重与赞美。这正体现了伊斯兰的“共同”（persamaan）和“友爱”（persaudaraan）的核心教义，通过在群体中所凝聚的神圣感，涌生对上帝内在的爱以及人类之间的友爱。“伊斯兰的社会主义”教导人们的不是“理论”，而是一种“义务”的实践（HOS. Tjokroaminoto 2010: 40-41）。此外，伊斯兰具有民主的特质，可以消弭社会与人类的阶级差别，像奴隶和主人的关系，扶助穷人、消除贫困。

不仅如此，伊斯兰具有很强的“团结”（kesatuan）意识，佐格罗阿米诺多相信所有的伊斯兰信徒只是一个“人”，他们共同拥有一个身体，相同的灵魂。这是高度含有“完整性”与“整体性”义涵的修辞说法。从另一方面来理解，就好像学习《可兰经》的经验，它必须是一个完整与整体的认识与吸收过程，例如一名印尼伊斯兰学者伊马杜丁（Imaduddin）在接受加勒比海作家奈波尔采访时说：“《可兰经》是一套价值系统。它就如同一辆车，车是一整套系统。如果你只拥有轮胎和车辆，就不算是拥有一辆车。伊斯兰教是一种系统，你必须整套吸收，否则就是背离。你不能做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穆斯林，你要么就当全心全意的穆斯林，不然就完全不是。”（奈波尔2016: 67）其信念在于，无论是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都不能被利己意识所牵引，它必须依循宗教信仰的基本教义。如果人们的作为没有受到宗教信仰的监督与引导，社会主义将会迷失，并带给人类灾难（HOS. Tjokroaminoto 2010: 114）。相信唯有宗教能引领人们追求高尚的愿景，以及完善人的生活。反观物质和情欲，前者让人趋向利己，后者使人注重自己的需求。

佐格罗阿米诺多的思想影响甚大，他的学生当中除了印尼总统苏卡诺（Soekarno）以外，尚有后来成为马来马共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向来被喻为重要的印尼共产党革命家陈马六甲。陈马六甲在1917年开始参加社会主

义思想运动，而印尼共产党在1920年成立后，他便成为重要的成员之一。陈马六甲曾经举出“在印尼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说明不能复制马克思或列宁的结论，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并非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导”（Tan Melaka 2000: 111）。纵然不同地域各有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文化条件，但就其普遍共同性而言，可以从三方面加以把握：一是辩证方法、二是物质理论、三是革命的进步精神。陈马六甲认为这些诠释是重要的，它可以协助把握不同阶段的斗争，同时拟定相应的策略方法（Tan Melaka 2000: 112）。他也提出迈向“现代共产主义社会”（Masyarakat Komunisme-modern）的想象，建立在共同工作以及共同拥有工具和成果的基础上，以有次序的安排和理性来规划每个人的所得⁷（Tan Melaka 2000: 91-100）。另，陈马六甲有一个“人文花园”（Taman Manusia）的构想，他在这座人文花园绘划出两座山峰的图景，一座是属于国际级别（International level），另一个是属于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亚洲级别（Asian Level）。他在属于国际的顶峰上放了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名字；至于在大印度尼西亚顶峰的两个名字，分别是两位出生在马尼拉（Manila），活跃在19世纪，被称为菲律宾革命之父的扶西·黎刹（Jose Rizal, 1861-1896）和安德烈·滂尼发秀（Andres Bonifacio, 1863-1897）。陈马六甲称他们为“纯粹的印度尼西亚人”（Pure Indonesian）。人文花园的构造思维说明了“共同体想象”当中的包容性视角（inclusive perspective），如何在群岛划出边界，甚至通过某种判准来建立起“邻里”以及“团结意识”的基础。换言之，是思想判断决定谁是自家人和谁是他者⁸（Ramon Guillermo 2017: 338-346）。

马来政治家与社会学学者赛·胡先·阿拉达斯在70年代出版的一本小书《伊斯兰与社会主义》（*Islam dan Sosialisma*），基本上依循佐格罗阿米诺多的思考，但更集中讨论和厘清伊斯兰和社会主义关系所面对的诘难，尤其是回应对以伊斯兰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质疑声音。阿拉达斯有几个清楚的论点：一、伊斯兰经典中的社会主义特征很早便获得承认；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同，以为马克思拒绝宗教而排斥社会主义；三、也有对宗教尊重的社会主义者，例如托尔斯泰

(Tolstoy, 1828-1910)、甘地(Gandhi, 1869-1948)、加牙巴卡西·纳拉扬那(Jayaprakash Narayana, 1902-1979)等(Syed Hussein Alatas 1976: 4)。阿拉达斯不把东方、西方以及伊斯兰和西方,放到对立的位置,相反的,他指出一般人的思想误区,总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西方的产物,却没有深入了解社会主义形成的多个不同源流。他认为无论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名称早在马克思之前,在1803年的意大利已被使用,无论谁作为西方社会主义之父,他们所依循的是穆哈默德的伊斯兰社会主义(Syed Hussein Alatas 1976: 4)。况且,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目标是消除贫穷和反对压迫,和伊斯兰教义并不相悖逆。阿拉达斯更指出当年担任首相的马哈迪医生,批评印尼伊斯兰教徒放弃自身的宗教信仰,以成就共产党的愿望;同时把马来人反抗政府和共产党反抗政府关联起来,不只思维逻辑上说不通,也说明对伊斯兰教义缺乏信心(Syed Hussein Alatas 1976: 62)。阿拉达斯具历史观与开放的思考,可供了解伊斯兰学者思考伊斯兰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争议思维、伊斯兰教义中和社会主义相同的特征,同时也展露作为伊斯兰教徒的高度自觉——纵然可兰经里的教义是完善的,但它面对不断改变的时代,伊斯兰教义如何提供更多适应与解释现代社会的能力,必须对其他思想保持开放与学习的心态。

此外,当代马来思想家,长期受左派政治信仰影响,虽非共产党员,但曾在早期马来人民政党扮演重要角色的卡欣·阿末,在《回家之路:从社会主义到伊斯兰》(*The Road Home: From Socialisme to Islam*)书中,除了述说他如何从社会主义回归伊斯兰,也提供了解如何思考现代伊斯兰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从哲学角度来思考二者。卡欣·阿末也曾受到佐格罗阿米诺多“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启发,佐格罗阿米诺多是在思考“伊斯兰是否反对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重要思想资源(Kassim Ahmad 2011: 72)。卡欣·阿末早期对马克思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乃是把握只有在无产阶级旗帜下,才能团结各种民族主义,要求实现真正独立的想法(Kassim Ahmad 2011: 130),实现出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过渡。后来他改变了认识的视角,把社会主义视为哲学,而非是政治经济组合的一部份。这样的转变源自于他对世界左派运动的反思

(Kassim Ahmad 2011: 130-131)，尤其是目睹世界左派运动的崩溃，特别是从苏联和中国二者的分裂，以及二者从追求共产主义到拥抱自由资本体制的表现，让他极为失望，促使他重新评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也因为如此，他曾积极推动在大学设立哲学系一事，认为伊斯兰也需要注入哲学的理性思考，只可惜哲学系最终仍没开设成功。在卡欣·阿末的认知中，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是一种生活之道，它并非只包含哲学和形上学的内容，也包括了伦理、法律，甚至是政治与经济、传统与宗教仪式的规则。真主的一体性是永恒的，但它内蕴的成分却会因应不同的空间，与时并进的变化 (Kassim Ahmad 2011: 139)。

以上扼要的论说，所选取的伊斯兰思想家，除了佐格罗阿米诺多和陈马六甲是共产党员以外，另外两位则兼具学者的身分。从他们侧重的思想倾向，无论是“伊斯兰社会主义”、“在印尼的马克思主义”或“作为哲学理性的伊斯兰”的主张，皆提供一些理解的凭借。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哲学理性的伊斯兰，都需要面对其时代环境、历史发展与地方脉络的差异和构成，或与国际革命思潮动向相关的因素。从思想内部与外部的互动过程，才能对思想的构造与行动作出较精准的判断。此外，伊斯兰思想家在思考以上问题时，自觉于对宗教圣经文本诠释的时代局限、反对者的知识理解与思维逻辑，以及一般大众的思想盲点。这不仅凸显该如何更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伊斯兰的关系，从另一方面而言，如何更正确认识伊斯兰及其思想世界，也成为该思想能否与其他思想保持开放互动或协调的关键因素。究竟以上的思考是否影响或反映了马来马共的思考方式与思想状态？以下将进一步论说。

三、马来马共的多重思想

马来人和马共的渊源可追溯至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立时期。不过在这之前，马来人最早结集的力量体现在1937年成立的马来青年协会 (Kesatuan Melayu Muda, 简称KMM)，该协会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Demokratik-sosialisme)，以争取马来亚独立与和印尼统一为目标。这

样的理想，最终在日军投降后，苏卡诺自行宣布印尼独立后而破灭。在英国人重返马来亚之际，马来人成立了各不同的左翼组织，其中马来马共与宗教民族主义者合作，引起了一些马来人的疑惑。例如布哈努丁医生（Dr. Burhanuddin）和拉昔·迈丁（Rashid Maidin）合作时，就被问道：“民族主义如何能对共产主义妥协？”（莫哈默·沙勒·蓝利2007：91）这是因为前者向来被看待为宗教民族主义者，而后者为共产党员。然而，在1947年成立的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简称PKMM），却主张把民族主义、宗教和社会主义三大思潮结合起来（Abdullah C.D. 2009：25），这除了显示不同思想意识的交融以外，也可窥知一般批评者并没有很好辨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差异。

马来马共第十支队于1949年5月21日，在彭亨州淡美鲁成立。当时参加的马来成员大多数来自马来青年协会、马来亚马来国民党以及祖国保卫队（Pembela Tanah Air，简称PETA）等成员。第十支队的自我认识是建立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可视其为“过去马来人爱国战争和农民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游砾译2007：25）。第十支队的命名，具有宗教意味，它指向穆斯林在回历最后一个月的第10天庆祝哈芝节，是“一个为了正义牺牲奉献的节日”（莫哈默·沙勒·蓝利2007：107）。在1954年撤退到泰南时，第十支队曾举办各种学习课程，旨在提高马来马共本身的知识视野，并拉拢泰南边境居民参与第十支队的活动。当中包括开办马克思学校、胡志明学校，列宁课程，以及研读毛泽东作品等。如莫哈默·沙勒·蓝利（Mohamed Salleh Lamry）在其研究中指说，纵然马来马共汲取这些思想，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履行宗教义务——“虽然他们学习马克思思想核心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他们似乎把它们当作与宗教同等的信仰。从他们的行为反映出，最适合他们的标签莫过于伊斯兰共产主义者。换言之，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干部，可是他们始终信奉伊斯兰教”（莫哈默·沙勒·蓝利2007：190）。莫哈默·沙勒·蓝利也提说：“他们也相信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也因为这样他们反抗殖民政府和欺压。因此，在信仰和个性上，他们显然反映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伊斯兰的综合”（莫哈默·沙勒·

蓝利2007: 190)。有意思的是,阿都拉·西·迪曾提出Nasionalis Agama Sosialis (NASASOS)的概念,其中连结的却是民族主义、宗教和社会主义,究竟该如何了解马来马共复杂、多元交叉的思想义蕴?阿都拉·西·迪以下这番话,可窥见一些端倪:

自从30年代以后,马来人主要的政治思潮有三种,即民族主义、宗教与社会主义。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我国的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及共产主义者结成了亲密的兄弟情谊。这从马来民族党本身走过的历史可以得到证明。他们彼此之间,一方面固然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则具有强固的政治共同点,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捍卫祖国和人民一起战斗的爱国者。正因为他们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所以他们能够团结和合作。他们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并肩战斗,以实现祖国的完全独立和人民的真正解放。这也充份证明,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及社会主义者都是对祖国和人民忠贞不二的爱国者。

(阿都拉·西·迪2010: 239)

阿都拉·西·迪本身在年轻时已受陈马六甲著作的启发(魏月萍2011: 6),他在总结世界的反殖反帝革命抗争经验时,提及自二战以后,在欧洲与亚洲的一些地方,已经被社会主义思想所笼罩,形成与资本主义抗衡的新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切都是经由革命抗争所达致(Abdullah C.D. 1998: 102)。他也清楚认识在争取祖国独立斗争过程中,个别派别和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都是“求同存异”(阿都拉·西·迪2010: 91)。纵然如此,从一些马来马共的回忆录或书写文字中,可以发现在紧急状态后的1954年退守到泰南边界时,要如何扩大第十支队队伍,寻求马来人的支持,这当中无法不思考有关伊斯兰的问题。阿都拉·西·迪联合其他伊斯兰革命青年,商讨成立一个伊斯兰革命政党,于是在1965年4月22日成立马来亚伊斯兰兄弟党(Parti Persaudaraan Islam Malaya,简称PAPERI)。这是一个地下组织,以游说穆斯林支持第十支队为主,并积极推动马来亚伊斯兰运动与马来亚的独立斗争(阿都拉·西·迪2010: 100)。马来亚伊斯兰兄弟党坚持的原则是——在宗教

界人士、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维护平民利益的国家（阿都拉·西·迪2010：96）。不过该政党的成立，很快被政府公然说成“共产党利用宗教”（阿都拉·西·迪2010：96）。针对此，阿都拉·西·迪表示：

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敌人。反共思想其实是作为资本主义鼻祖的殖民主义者培植的。我在战后，也就是1945-1948年的马来人斗争中看到，整体而言，主张独立的进步的马来人都不反共，只有那些与殖民主义者关系密切的、那些代表巫统的人才坚决反共。

在祖国独立的伟大斗争中，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宗教界人士都团结在一起，反对殖民主义者。在马来亚，马共和马来亚马来国民党密切合作，富有远见的宗教界领袖布哈努丁医生就是我最亲密的战友。人民力量中心与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PUTERA-AMCJA）的联合阵线就是各种力量团结起来的明显例子。面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时，马共没有站在前面，而是在这一联合阵线后面起到最重要的作用。这种状况在印尼也出现过。他们在NASAKOM即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的原则上建立了联合阵线。⁹

（游砾译2007：13）

阿都拉·西·迪“主张独立的进步的马来人都不反共”，展现他的进步思想，但在现实中，他仍被人强迫礼拜，以威吓口气命令他“重新入马来教”，并被指责说：“那些共产党破坏宗教”。这事让他深感不解，他的双重认同被质疑，以致感慨自我叩问：“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不是马来人吗？从马六甲王朝开始，马来人就已信奉伊斯兰教，在伊斯兰的基础上发展了马来人的文明和民族光辉。而且我是在马来人家庭诞生，又是穆斯林。我从小就学习伊斯兰教和马来风俗习惯，因此我自身的马来人和伊斯兰并没有改变。”（阿都拉·西·迪2007：89）

另一名马来马共依布拉欣·吉（Ibrahim Chik）则在其回忆录记载当第十支队抵达泰南和平村时如何召集村民，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建立起清真寺，提供马来马共和当地穆斯林，一个祈祷、斋戒以及学习伊斯兰教义

等的场所。在这之前，大多数在泰南的穆斯林只能在简陋的茅屋，学习和宗教相关的知识。建造清真寺与学习伊斯兰这回事，消弭了当地人对马共不虔诚于宗教的猜疑，同时也击破英殖民政府想要借由宗教来诋毁马来马共的手法（Ibrahim Chik 2010: 121-122）。由此可知，对于“合格”的穆斯林的认证似乎长久存在。依布拉欣·吉记述他在2008年一份名为*Fajar Islam*的报纸上，读到有关第十支队一些重要队员在访谈中表达对宗教信仰的看法，间接粉碎英殖民政府把马共标签为暴徒、背叛者的阴谋，而感到莫大的欣喜。这无不说明对“伊斯兰”的虔诚，是对“穆斯林”、“马来人”的宗教与民族身份忠诚与否的检验标准（Ibrahim Chik 2010: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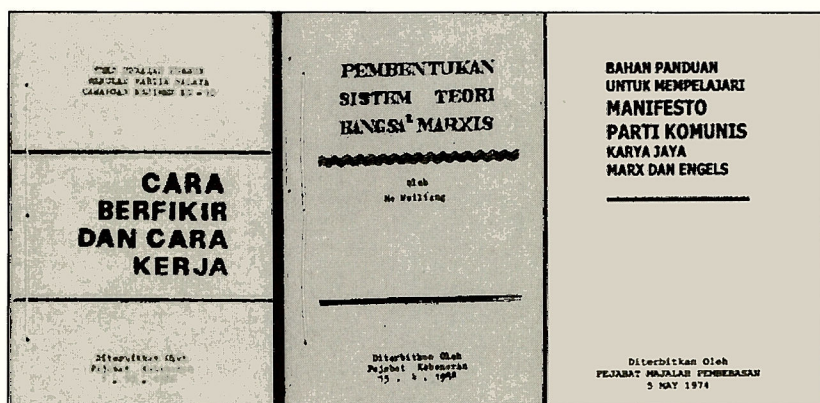
在这样的自我认同底下，马来马共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又是如何？阿都拉·西·迪在接受访问时被问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时，说了以下这段话：

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祖国独立、人类社会进步斗争的最佳武器。我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或者是僵硬的和不可以改变的死硬原则，而是根据马来亚的条件和情况来运用它。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应用了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宗教或者反对宗教。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殖民主义者挑唆的毒化结果。马共推行的是宗教自由、尊重各族人民习俗的政策。我生来就是伊斯兰教徒，也是在伊斯兰教的教化下长大的。不论我走到哪里，这种信仰都不会改变。

（游砾译2007：12）

阿都拉·西·迪把马克思指说的工人阶级，视为是解放人类的革命阶级。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使俄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他认为在马来亚，农民阶级如同工人阶级，是一股社会主义力量（阿都拉·西·迪2010：60）。在马来马共重要干部当中，除了阿都拉·西·迪以外，尚有拉昔迈丁、慕沙阿莫（Musa Ahmad）、瓦西·安努亚（Wahi Anuar）、珊霞·法奇（Shamsiah Fakeh）以及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等人，都是通过由马共总部举办的“马来亚马克思主义学校”来认识马克思思想。该学校前后邀请印尼的阿里敏（Alimin）、桑托

斯伯（Pak Santos）和苏帕托（Suparto，又名苏来曼Sulaiman）来授课。课程内容包括俄国十月革命、东南亚共产党的革命计划、马克思理论以及共产党思想等。其中也强调共产党群体和宗教群体的关系，以及马来亚共产党的战斗和印尼各不同党派之间的互动（Mohamed Salleh Lamry 2006: 102-105）。有关马克思理论，则主要介绍有关社会阶级历史的起源、阶级觉醒与矛盾，例如施行压迫的阶级——封建地主与资本家，而受压迫的阶级为农民和劳工（Mohamed Salleh Lamry 2006: 105）。这之后居住在泰南的马来马共也翻译了不少有关马克思思想的书籍，其中如《思维的方法与工作的方法》，尤其特别强调用“普遍性”的世界观来审视各地的无产阶级基础，其中包括精神、物质以及主客观的问题。从中把握人的知识能力和思考规律，然后再利用这方法理论来把握世界各不同的现象，以革命方法推进，找到解决的方法。其次是把握“自我立场”的建立，先行确认一个人是秉持无产阶级抑或资产阶级的立场，因为选择怎样的立场，即意味着决定一个人如何处理事情的方法。¹⁰



图：第十支队出版有关马克思理论的书籍¹¹

在马来马共当中，阿都拉·西·迪和卡玛鲁札曼·铁（Kamarulzaman Teh）有较相近的背景，都是属于甘榜菁英后代，两人曾就读于江沙克列福英文源流学校（Clifford School），大量阅读学校里收藏有关欧洲革命、印尼共产党抗争、法国大革命以及殖民地时期马来亚的历史书籍。如卡玛鲁札曼·铁所说，这些书籍让他认识到所谓的自由、共同与友爱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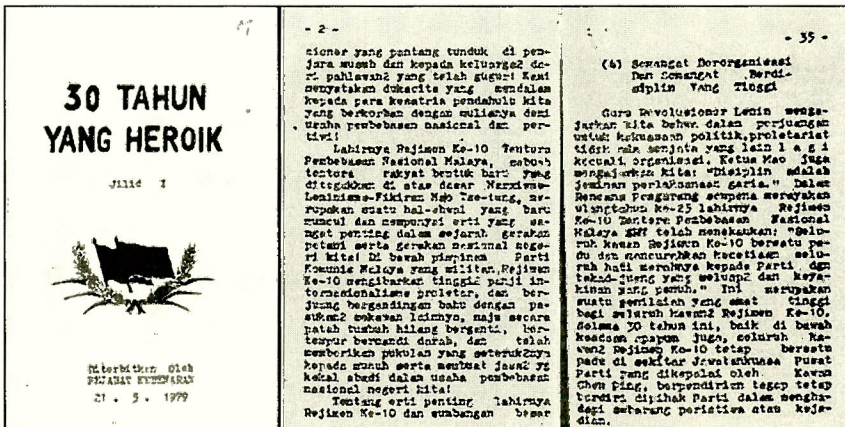
(Mohamed Salleh Lamry 2006: 88)。而影响阿都拉·西·迪较为深刻的，则是有关马来半岛历史书籍，启发他对马来亚独立和马来人斗争问题的觉醒（阿都拉·西·迪2007: 10）。

本人在一篇有关谈论马来马共的历史论述与制约的文章，曾提出以下评断：

在冷战局势下的马来马共，对共产主义的吸收是出自战略的心理，而并非把它看作是信仰或意识形态，这才能说明为何他们得以妥善安顿共产主义、伊斯兰主义以及民族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而爱国、民族与民主的因素，也成为他们和其他左翼力量之间可以合流或合作的最关键原因。马来马共作为马来政治文化左翼力量的一环，所参与的马共斗争后来亦形成马来本土政治系谱的其中一个流派。

(魏月萍2011: 13)

马来马共阿纳斯·阿都拉（Anas Abdullah），在访谈中亦曾提及，马共的纲领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共和国”。但在70年代以后，马共便不提共和国的倡议，是因为共和国反对苏丹制。那时马共觉察大多数人拥护苏丹制，须调整其姿态，等候更成熟的时机才提出。阿纳斯也说，当时的想法是，先民主主义之后，才社会主义，同时不排斥苏丹的存在。¹² 由此可见，无论在纲领或思想实践上，都看出其灵活与变通。



图：第十支队成立30周年纪念刊¹³

另外，我们可从第十支队庆祝成立30周年特刊里，把握马来马共对马列和毛泽东思想战略性吸收的线索。如特刊里提及第十支队是以马列和毛泽东思想为依据而成立的一支新士兵部队，称列宁为革命之师。特刊中也强调须谨记毛泽东的教导——把“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Disiplin adalah jaminan pelaksanaan garis）视为纲纪。¹⁴ 甚至以毛语录的话来巩固士兵的信念，例如提及“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会继续战斗下去。”（Tentera ini mempunyai semangat maju terus pantang mundur. Ia akan menaklukkan semua musuh dan sekali-kalinya tak akan ditundukkan oleh musuh. Baik dalam keadaan yang betapa pun sulit dan beratnya, selama masih ada seorang yang tinggal, ia akan terus bertempur）¹⁵ 这显示对马列或毛泽东思想的吸收与贯彻，多半是出自队伍的战役策略、纲纪与士气提升考虑，并且认为毛泽东所带领的革命，是真正吸收马列思想，再从中国的革命脉络与问题语境，拟出一套战斗策略，提炼出具有在地脉络的革命思想。¹⁶

概括而言，从马来马共一些领袖人物的思想启蒙与构成，可理解马来马共是在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基调上，吸收有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而伊斯兰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无论是革命行动或所谓的圣战，都是在阿拉允许下的正义行为；个人的殉身，亦代表对信仰真理的勇敢实践。可知在一个战斗的大目标下，俨然跨越了族群、思想意识形态和宗教的狭隘界限，不但在重多的思想世界里提取养份，也突出马来人的革命思维方式。于此才能知悉为何在纷扰的政治气氛里，面对英殖民政府或马来政府的挑拨与控诉，马来马共如何采取一套安顿其作为伊斯兰信徒、马来人以及革命者多重身份的适世之道。

四、结语

从“历史—思想”的视角，追溯马来马共的多重思想世界，尤其是和伊斯兰纠结的问题，究竟试图揭示什么问题？首先，可了解在殖民地时

期，加入反殖反帝抗爭的马来人，在其民族与宗教身份上，为何必须不断“自我证明”，如同塞伊德·阿尔维所说：“马来人一直承受必须自我证明的压力。一般人认为马来人没有能力成为有思想的人，认为马来人是习惯的产物，是苏丹或英国人的子民。他们必须依赖别人为他们思考、领导他们，他们会忠心耿耿地效忠苏丹、效忠英国人，英国人则施行法律予以保护，作为回报。法律规定，非马来人不得干预马来人的习惯与生活方式。”（奈波尔2016：515-516）其次，作为一名穆斯林，如何思考宗教信仰所引导出的革命爆发力，抑或思想意识形态的冲突？此外，在进行革命当中，如何具有思想安顿的能力，在政治、宗教与社会之间，各取所需？前面所论及马来马共的思想吸收与状态，从他们的自我意识的表露，可知信仰的力量促使的不仅是世界观的改变，信仰者的生活实践、革命实践都含有神的意示与暗示。宗教的力量，不但增强人的行为意向；在马来马共在其革命世界里，现实考验的严峻，也是必要通往了解神的旨意的渠道。然而，与阿拉真主关系的证成，究竟有没有一套规范的检验方式，那是内在的渠道抑或外在的途径，这一些已然在历史抗争以及不同的思想竞争中，形成一种受困的思想，思想的内在困境。例如曾询问阿纳斯·阿都拉在森林中如何遵行祷告的规定，可了解马来马共仍竭力遵行伊斯兰教义与仪式，但一些信仰仪式会因应不同情势而简化。¹⁷

在抗争历史中的马来马共，已然把马来民族、穆斯林和革命者三者牢牢的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左翼穆斯林、社会主义穆斯林或共产主义穆斯林，究竟一哪个思想意识为主导，难以找出一套明确的思想排序，但毫无疑问的是，伊斯兰是主要的内核要素。而审视在历史过程中思想构成的要素，以及受不同环境或情境被迫作出的思想折衷，虽仍无法构造出完整的马来马共思想（史）。但我们仍能从马来马共的思维以及思想资源的吸收，把握其在历史变动中的思想构成与倾向。同时值得思考的是，伊斯兰作为一种信仰理念，引导人的生活与实践；民族主义作为马来民族与马来文明的荣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打破阶级不平等与压迫、歧视的方法；爱国主义则作为对祖国的热爱与捍卫等，这一些在伊斯兰思想世界已有丰富的交融和累积，折射出多元与开放的思想意识。但历史与思想演变

至今，每一种思想意识都可能随着情境转变为排他思想，或变调成为压迫的语言，其深层原因何在，值得进一步深化。至于历史与思想的诠释，如何不被政治正确建构的神话所绑架，就需要更多元的诠释观点，让政治正确的观点也仅成为“其中一种诠释方法而已”。此外，经由边缘视角构成的思想与历史，亦在主流与官方历史单向的认知解释以外，成为另一种替代思想历史的参照，亦可反映大时代中思想的多元、混杂甚至是局限。

注释

- 1 其他相关论述，可参Mohamed Salleh Lamry (2015)；Cheah Boon Kheng (1983)；C.F. Yong (1997)；魏月萍 (2011)。
- 2 又如目前居住在泰南苏基林和平村 (Kampung Sukhirin)，目前为泰国和平村联合会阿纳斯·阿都拉 (Anas Abdullah) 透露，马来人参加左翼抗争行动，不是受到1948年紧急状态颁布的冲击影响。那是段更长久的历史，自殖民者侵略马来亚开始的反殖运动以来，那是一种延续性，不是突然的情况。2016年7月17日于泰南苏基林和平村的访谈。
- 3 阿都拉·西·迪把马来人的爱国主义传统，追溯至1511年以来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促使马来民族成为被统治与被压迫的民族。为了恢复祖国的独立和民族尊严，马来人在历史上进行了多场的爱国与农民战争，从而形成马来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 4 阿布·沙玛在50年代后半旬被任命为十支司令部成员，1975年起担任马共中央委员。
- 5 据知，为了平息马来人对土地的愤怒与抗争，英殖民地政府在1913年11月25日通过马来人保留地文法，并把“马来人”定义为“讲马来语以及信奉伊斯兰”的民族。表面上这是为了照顾马来人利益，避免土地受华人或印度人侵占，实际上是有意的区隔乡下与城市的经济活动，并且抑制马来无产阶级意识的成长。
- 6 在反殖反帝以及争取独立或准备迈向独立现代国家的东南亚周边，彼此想象与经验着“革命”、“民族主义”以及“现代国家”等不同的想望，由此凝聚出“群岛意识”与“群岛情感”。群岛之间的反殖反帝目标很清楚，大家都有同属性的敌人，但群岛之间也存在族群与文化多元的因素，分划出各不同的想象共同体，彼此在想象与落实现间冲撞、折衷、交融或排斥。
- 7 陈马六甲的“现代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想象，按照他的思想蓝图，那是一种从资本社会到共产社会的过渡。而在这过程中，或会出现无产阶级的独裁者。陈马六甲对新旧社会的转变，以及如何从中吸收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建立无产阶级社会，有详细的论述，请参Tan Melaka, *Dari Penjara ke Penjara* (Bahagian

Tiga), pp. 91-100.

- 8 菲律宾学者拉蒙·吉列尔莫 (Ramon Guillermo) 认为, 陈马六甲把扶西·黎刹和安德烈·滂尼发秀纳入在他所想象的纯粹的印度尼西亚人范畴, 说明了他的“大印度尼西亚”的观念。另外, 陈马六甲又划出一个属于“Ke Taman Raya”的群体名字, 列出印尼共产党多位领袖人物的名字, 而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即很好的结合伊斯兰和共产主义。详论参Ramon Guillermo (2017)。
- 9 须特别注明的是, NASAKOM是在苏卡诺时期以“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为原则的组织, 引文中出现“社会主义”之名, 实有笔误, 感谢匿名评审指出这点, 特作澄清说明。
- 10 *Cara Berfikir dan Cara Kerja*, Teks Huraian Kursus Sekolah Marxist Malaya, Cawangan Rejimen Ke-10, diterbitkan oleh Pejabat Kebenaran, 1 Oktober 1986, pp.1-3. Malayan People's Army. 10th Regiment Archives,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ISH), <https://socialhistory.org/>
- 11 资料来源: Malayan People's Army. 10th Regiment Archives,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ISH), <https://socialhistory.org/>
- 12 访问进行于2016年7月17日于苏基林和平村。
- 13 资料来源: Malayan People's Army. 10th Regiment Archives,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ISH), <https://socialhistory.org/>.
- 14 *30 Tahun Yang Heroik* (Jilid 1), Pejabat kebenaran, 21 Mei 1979, p. 35. Malayan People's Army. 10th Regiment Archives,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ISH), <https://socialhistory.org/>.
- 15 *30 Tahun Yang Heroik* (Jilid 1), Pejabat kebenaran, 21 Mei 1979, p. 57. Malayan People's Army. 10th Regiment Archives,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ISH), <https://socialhistory.org/>.
- 16 *Pedoman*, bil 1, November 1962, p. 9. Malayan People's Army. 10th Regiment Archives,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ISH), <https://socialhistory.org/>.
- 17 访问进行于2016年7月17日于苏基林和平村。

参考文献

中文著作

- 阿都拉·西·迪2007。《马共领袖阿都拉·西·迪回忆录(上)——截至1948年的活动时代》。吉隆坡: 21世纪出版社。
- 阿都拉·西·迪2008。《马共领袖阿都拉·西·迪回忆录(中)——第十支队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吉隆坡: 21世纪出版社。

- 阿都拉·西·迪2010。《马共领袖阿都拉·西·迪回忆录（下）——边区的斗争与光荣的和解》。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 奈波尔（V.S Naipaul）2016。《信仰之外——重返非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台湾：马可亭罗。
- 莫哈默·沙勒·蓝利（Mohamed Salleh Lamry）著、谢丽玲译2007。《马来西亚——马来左翼运动史》。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 游砾译2007。《伊斯兰·马来人·共产党——阿卜杜拉·西迪、拉昔·迈丁、阿布·沙玛访谈录》。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 苏丽雅妮·阿都拉（Suriani Abdullah）2005。《第十支队与独立——荆棘满途的马来西亚民族斗争史》。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马来文著作

- Abdullah C.D. 2005. *Memoir Abdullah C.D.(Bahagian Pertama): Zaman Pergerakan Sehingga 1948*, Kuala Lumpur: SIRD.
- Abdullah C.D. 2007. *Memoir Abdullah C.D.(Bahagian Kedua): Penaja dan Pemimpin Rejimen Ke-10*, Kuala Lumpur: SIRD.
- Abdullah C.D. 2009. *Memoir Abdullah C.D.(Bahagian Ketiga): Perjuangan di Sempadan dan Penamatan Terhormat*, Kuala Lumpur: SIRD.
- Abdullah C.D. 1998. *Darurat dan Kemerdekaan: Memperingati 50 Tahun Darurat di Tanah Melayu*, Hong Kong: Nan Dao Publisher.
- Ibrahim Chik 2010. *Memoir Ibrahim Chik: Dari API ke Rejimen Ke-10*, Kuala Lumpur: SIRD.
- Mohamed Salleh Lamry 2006. *Gerakan dan Tojoh Kiri: Kamarulzaman Teh dalam Kancah Perjuangan Kemerekaan*, Kuala Lumpur: SIRD.
- Mohamed Salleh Lamry 2008. *Abu Samah Mohd Kassim: Pejuang Kiri Kemerdekaan Zuriat Datuk Bahaman*, Kuala Lumpur: SIRD.
- Mohamed Salleh Lamry 2011. *Siti Norkiah Mahmud: Srikandi dari Pahang Utara*, Kuala Lumpur: SIRD.
- Oemar Said Tjokroaminoto 2010. *Islam dan Sosialisme*, Bandung: Segi Arsy.
- Rashid Maidin 2015. *Memoir Rashid Maidin: Daripada Perjuangan bersenjata Kepada Perdamaian*, Kuala Lumpur: SIRD.
- Said Zahari 2015. *Suara Bicara: Fragmen Memoir Said Zahari*, disunting oleh Abdul Rahman Embong, Kuala Lumpur: SIRD.
- Suriani Abdullah 2006. *Memoir Suriani Abdullah: Setengah Abad Dalam Perjuangan*, Kuala Lumpur: SIRD.
- Tan Melaka 2000. *Dari Penjara ke Penjara*, Jakarta: Teplok Press.

英文著作

- C.F. Yong 1997.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 Cheah Boon Kheng 1983.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1-1946*,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Hassan Abdul Mutalib 2010. “The End of Empire: The Films of The Malayan Film Unit in 1950 British Malaya”, in *Film and The End of Empire*, edited by Lee Grieveson and McCab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Palgrave Macmillan.
- Kassim Ahmad 2011. *The Road Home: From Socialisme to Islam*, Selangor: ZI.
- RustamA.Sani 2008. *Social Roots of the Malay Left: An Analysis of the KesatuanMelayuMuda*, KualaLumpur: SIRD.
- William R.Roff 1967. *The Origin of Malay Nationalism*,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 Syed Hussein Alatas 1976. *Islam dan Sosialisma*, Pulau Pinang: SeruanMasa.

中英文期刊论文

- 魏月萍2011。〈马来马共的历史论述与制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4期。页1-23。
- Abdul Rahman Haji Ismail 2009. “1948 and The Cold War in Malaya: Samplings of Malay Reactions”, *Kajian Malaysia*, vol 27(1, 2). pp.155-178.
- Mohamed Salleh Lamry 2015, Translated by Isrizal Mohamed Isa 2015. “A History of the Tenth Regiment’s Struggl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18, no. 1. pp.42-55.
- Ramon Guillermo 2017. “Andres Bonifacio: Proletarian Hero of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18, no. 3, September 2017. pp. 338-346.

第十支队档案与出版物资料库

Malayan People’s Army. 10th Regiment Archives,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ISH), <https://socialhistory.org/>

马来马共访谈

2016年7月17日访问前马来马共，目为泰国和平村联合会阿纳斯·阿都拉（Anas Abdullah），于泰南苏基林和平村（Kampung Sukhirin）。